

论李长之的文学批评

罗伟文

摘要: 李长之的文学批评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以融会中西而创新的学理自觉,李长之建构了灵妙与思辨兼容,饱含丰厚人文精神的批评理论。这一批评理论的独特性表现在:倡导感情的批评、强调理智的硬性、巧抓本质和进展。认真挖掘和阐释这位富有魅力的批评家,对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关键词: 李长之;文学批评;创新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07)10-197-03

作者: 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集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李长之曾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声名显赫的学者。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李长之在此后的风云变幻中遭遇了多舛的命运,其应有的学者光彩长期受到遮蔽。但世异时移,当历史的烟尘散尽,人们得以透过遮蔽而目睹他的本真面目时,李长之独特的魅力必然会彰显出来。九十年代以来,李长之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兴趣,一些有影响的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充分肯定李长之在批评史上的应有地位。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李长之文学批评的独特魅力和价值值得反复审视和玩味。因此,认真挖掘和阐释这样一位富有魅力的批评家,无疑将对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对于文学批评,李长之是心怀抱负的,他曾立志要使文学批评成为“一门专门之学”。为达此目的,李长之有着“中西合璧、古今融合”的学理自觉,他特别推崇前辈批评家王国维,赞赏他那种“承了传统的中国式的批评方式,颇又接受了点西洋的思潮”的批评范式,将之视为自己追求和实践的理想目标。李长之正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地上,又吸纳糅合西方文化的资源,在中西融合中建构了灵妙与思辨兼容,饱含丰厚人文精神的批评理论的。

李长之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初中时,李长之潜心研读中国古典文学。对古典文学的喜爱,不仅培养了李长之敏锐的文学鉴赏力,也强化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为他日后从事文学批评打下了坚实的文化根基。综观李长之的批评理论,可以发现他的文学批评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牵连。具体表现在:一是整体意识。中国传统文化视艺术如生命,因此对作品的品评往往重视整体的把握。对此传统,李长之是心领神会的。他十分强调将整体意识贯穿到对作品、作家和文学活动的理解中。对于作品而言,李长之认为文学批

评应包括理解作品、批评作品和提出正面主张三个环节,它是一个逐渐深入的完整过程;对于作家而言,李长之主张批评一部作品,必须了解作家的整体;对于文学活动而言,李长之把文学看成是文化的一部分,认为“文学内容不是独立的,而是有着文化价值的整个性的”。^[1]可以说,对整体意识的强调成了李长之批评理论的突出特色。二是直觉感悟。重视对作品内在审美特征的直觉感悟是中国审美文化的兴趣焦点,它要求鉴赏者从文本的刹那感受出发,用诗意的语言传神地点化出鉴赏者的体验和感受。李长之在批评中借鉴了这种传统的品评方法,善于用诗意的语言传达对对象的灵悟妙识。阅读李长之的批评文字,随处可以看到这种精彩的感悟式品评。如《鲁迅批判》论及《离婚》中写众人围观七大人手中的“屁塞”,李长之认为这段文字在“技巧上都够上不苟”,接着他品评道:“多么刻画传神!用字是多么简洁,俊拔,所以我说凝练。”^[2]这段品评完全靠批评者的直觉感悟,用语言简意赅却十分精彩。当然,李长之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中国的传统感悟与西方的逻辑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他的批评文字在灵动中又伴随着一种思想的穿透力。

李长之又深受德国古典精神的濡染。受名师杨丙辰的指导,李长之爱上了德国文化,对德国古典哲学、美学思想更是推崇备至。德国古典文化的濡染给李长之的思想烙上了绵密与精深的风采。李长之在构建自己批评理论时吸纳的德国古典文化资源主要表现在:一是人文精神。李长之曾在《德国的古典精神》的序文中指出,他向往古希腊、周秦和古典的德国这三个时代。因为这三个时代“都是企求完人,都提高了人的地位,同时那些思想家本人都是一些有生气的活人”。^[3]而李长之所景仰的那些德国思想家都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芒。温克尔曼“以完人为理想”,是古典精神的奠基者;康德提高了人的地位;宏保耳特“正是人本主义的化身”。德国思想家的人文情怀使李长之寻找到理解人之为人的心灵钥匙。从李长之的批评文本中,可以窥探到李长之所张扬的人的精神本性,这一精神本性突出地体现在对自由的追求中。李长之清楚地看到,德国思想家关注人的自由,并将艺术和美视为实现人的内心自由的必由之路。对自由思想的向往使李长之在司马迁、李白、鲁迅这些伟人身上找到了心灵共鸣。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李长之认为在司马迁的书里,“可以听到人类心灵的真正的呼声”,^[4]在发愤抒情中渴盼自由。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极其痛苦》中,李长之说:“李白的价值是在给人以解放”。^[5]对自由的追求成了照耀李长之批评文本最耀眼的光芒,是它的核心价值所在。

二是思辨体系。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家醉心于建构严整的思辨体系,他们建构的这些体系其伟大恢弘的程度让世人

叹服。李长之曾刻苦钻研过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尤其服膺于康德的哲学思想,对康德的三部巨著所构筑的批判体系崇拜备至。这极大地影响了李长之对哲学的理解,他认为哲学的特殊精神在于它“仍是重系统”,“世界上再没有比哲学更重系统的学问,也再没有比哲学家更爱系统的人物”。^[6]在这种观念的影响和催生下,李长之在批评中也特别重视批评体系的建立,他从文学批评的性质、对象与范围以及功能、方法等方面努力地建立自己的批评体系。而在具体的批评活动中,李长之则极力摆脱传统感悟式批评方式的制约,自觉地追求批评的理论高度,建立完整的批评体系。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就是一部规模宏大的批评专著,全书有序言、导言、正文和总结,整个文本“在文化的整体构架中发掘文学的意蕴”。^[7]当时的著名刊物《青年界》评论说该书“有组织、有体系”,“是中国批评界上划时代的一本著作”。的确,该书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结构。更让人惊喜的是,《鲁迅批判》中不再是点到即止的主观印象,而是有观点有论证的系统阐述。

三是独立精神。在德国文化中,独立被视为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德国的思想家们无不是独立地进行思考,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探索宇宙、社会、人生和艺术的奥秘,艰辛地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康德大声地呼吁人“要勇于运用你自己的聪明才智”;歌德认为“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这种崇尚独立的精神从灵魂深处滋养了李长之的心灵,使他养成了蔑视奴性,向往独立的精神人格。李长之一生不屈从于政治,不媚俗于权威,不遮蔽于偏见,就是这种独立精神的体现。而对批评独立的追求,正是李长之独立人格的体现。对文学批评,李长之反复强调它应该有“独立的价值”。他反对批评依赖于任何外在目的,反对文学纠缠于政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思想的问题和思想以外的事情(例如政治)搅在一起,便容易做造许多‘违心之论’,这便不会产生真的批评。”^[8]因此,李长之的文学批评总是以自己的艺术体验为依据,独立地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他的《鲁迅批判》能超越当时外在观念的束缚,道出鲁迅价值的真谛,就得益于他的独立人格。

二

在中西文化的融通中,李长之精心地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批评理论。而通过具体的批评实践,李长之尽情地挥洒着自己的才情,实践着自己的理论追求,在三、四十年代的批评界形成了一道独异而亮丽的风景。走近这道风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多姿多彩的迷人世界。综观李长之的批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这么几个主要特征。

(一)倡导感情的批评。李长之认为,感情在创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感情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几乎是水对于生命似的。”^[9]同样,李长之也特别强调感情在理解和批评作品中的作用,提倡“感情的批评主义”。他说:“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观,因为不用感情,就不能见得亲切……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明目张胆的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10]在李长之看来,要使批评“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就须采用感情的批评。怎样才能做到感情的批评呢?李长之提出批评家应该与作家实现感情心灵的沟通,实现这一心灵沟通的途径是:批评家“跳进作者的世界”,以设身处地的体验来达成“根本的感

情”的沟通。循此思路,李长之提出“感情的型”这一概念,作为批评家的最高原理。“感情的型”是抽走了“感情对象”的抽象形式,它是一种能够普遍传达和体验的人类共通情感形式。李长之说:“在欣赏者所得到的那种最高最好的,我便名之为感情的型,能够表现了,我便名之为技巧的最高点。”^[11]感情的型便成了李长之衡量作品优劣的最高标尺。《鲁迅批判》就是李长之实践感情批评的成功文本。在《鲁迅批判》中,李长之真诚地深入到鲁迅的内心世界,用“感情判断感情”,从而体验作家的悲欢。他在评论《阿Q正传》时就用自己的灵魂去体验笔下的人物。他分析道:“鲁迅那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最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阿Q已不是鲁迅所诅咒的人物了,阿Q反而是鲁迅最关切,最不放心,最为所焦灼,总之,是爱着的人物。”^[12]这一渗入批评家强烈感情体验的批评文字,鲜明体现了李长之倡导的“感情的批评”的美学原则。

(二)强调理智的硬性。李长之虽然强调感情在批评中的作用,但他并不认为批评就是任由感情自然宣泄。他清醒意识到如果“批评家对作者太用感情”,那么就会导致批评“至失其当”。因此,他明确指出批评中理智也是不可或缺的。李长之认为批评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感情与理智的相互协调,在他看来,批评应“永远是二者的起伏,一是感情,一是理智。”^[13]这就要求批评家既能体验作家的感情,同时又具备较高的理论深度。因为批评家要说服人,就得讲逻辑,思想圆通。李长之将批评家的这一素养称为“识力”,也就是批评家“鉴定、选择、判定、烛照到大处的眼光和能力。”这种识力就是批评家应具有的力量,一个严谨的批评家就是要充分发挥这一理智的力量,才能“确然不疑地道出伟大著作的实际”。为此,李长之从形式上将文学批评的问题规定为四项:“一是看一个作品说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二是看一个作家表现成功没有?这是一个美学和语言学的问题”;“三是看一个作者该不该那样说?这是伦理方面的问题”;“四是看一个作者为什么表现这样而不表现那样?这是社会学的问题,心理学的问题,人类学的问题”。^[14]这四项问题的解决便是理智的职分。从上分析可以看出,李长之倡导的理想批评应该是感情与理智的和谐互补。这是李长之深受德国古典精神影响,重视哲学思考的结果。因为哲学思考需要的就是理智。另外,李长之还指出批评“当以科学的精神治之”。这就要批评家有“求真”、“求善”、“求美”的决心和勇气。为此,李长之提出“理智的硬性”这一概念,即批评家要有硬性的批评精神。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是:坚持正义感、宣扬美好的事物、反抗邪恶,它要求批评家不盲从、不妥协,敢争一个真是非。因此,当批评家从事批评活动时,他必须做到“如老吏断案,铁面无私”。他说:“批评需要分析,不但好坏分明,就是好之中的坏,坏之中的好,也要分明。”^[15]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李长之在评价鲁迅时没有任何顾虑,切实做到“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在《鲁迅批判》中,李长之既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称他是“一个最煊赫的代表者”,同时又客观地评说他在“文艺创作上的失败之作”。这种批评精神铸就了李长之特立独行的批评风格。

(三)巧抓本质和进展。李长之对当时批评界盛行的政治、经济式批评深感不满,主张批评应“注意本质和进展,力避政治、经济论文式枯燥”。^[16]在李长之看来,诗的本质在于“真

的情感”，而真情感的“高下大小”则依赖于诗人的人格。李长之认为时代、社会的因素正是通过“人格”这一中介才能产生影响。因此，要把握作家的“独特生命”，只须探寻追踪作家的人格精神，进而探求人格精神的进展与折射，最终达到阐释人格与风格的统一。这就是李长之说的：成功的批评“对一个作家当抓住他的本质，并且须看出他的进展过程来”。《鲁迅批判》中，李长之注重鲁迅独特的人格风貌，他将鲁迅的“人格风貌”描述为诗人和战士。认为鲁迅是对“旧制度旧文明施以猛烈的攻击的战士”，而鲁迅作为诗人却绝非“吟风弄月的雅士”，他的灵魂深处“乃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和一种粗暴的力”。通过这种人格风貌的梳理，李长之考察了鲁迅作品的艺术风格，指出“悲哀同愤恨，寂寞同倔强，冷观和热情，织就了他所有的艺术品的特色”。至于批评过程中的抓“进展”，李长之将鲁迅的生活及精神分为六个时期，认为“每一时期，外在的环境都有一种非常的变更，他自己的生活上也都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和显然的影响”。从而在人生的大环境中探讨了鲁迅的精神进展。在《道教徒的李白及其痛苦》中，李长之先揭示李白不同寻常的人格形象，认为李白的一切就是“生命与生活本身”，在他身上存在着一种“太人间”的欲求，这种欲求使他难以摆脱“人间的永久的痛苦”。然后阐明李白诗风体现出来的生命与生活欲求的“豪气”。^[17]正是这种深入、独到的人格理解，使李长之能触摸到李白灵魂的深处，并解读到李白浪漫奔放形象下的那种“超人的痛苦”。李长之把这种批评方法运用到他的批评活动中，在三、四十年代形了解读阐释的独异性。

三

李长之命运多舛，饱受磨难。但他钟爱自己的批评事业，他以自己的生命抒写着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演出了一幕虽苦涩但却悲壮的人生交响曲。李长之以丰厚的批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阅读李长之的批评文字，倾心领悟他的批评思想和学理追求，对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一)融会中西而创新的学理自觉。李长之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他立足深厚的传统文化，同时又吸纳了西方优秀的文化资源，在中西融会中创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批评理论。司马长风曾高度评价李长之说：“既不盲目西化或附和苏俄，也不冬烘保守，而主张以中国文学为主体，融会中西而创新。”李长之的批评既有鲜活生动的艺术感受，又有清晰严密的逻辑思辨，鲜明地体现了灵妙与思辨兼容的个人特色。应该说，这种中西融会的运思策略，是我国批评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途。举目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一些批评或食洋不化，喋喋不休地贩卖西方的思想文化；或沉溺于个人主观感受，恣肆汪洋地追逐话语狂欢。如何救治时下批评“失语”、“自恋”的困境，从李长之文学批评的运思策略中我们将获得有益的启示。这就是：走中西融会而创新的学术道路是摆脱当下批评困境的有效策略，而对我们建设富有民族特色的批评理论也将大有裨益。

(二)“求真”的批评态度。“求真”是确保批评富有生命力的基本前提。李长之终生坚持以求真的态度去进行批评，

认为这是批评者的唯一的态度。他说：“我的用意是简单的，只在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批评者的唯一的态度。”^[18]正因为求真，所以李长之“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顾忌，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而要切实做到这点，不仅要求批评家有对文学的热情，同时也要求批评家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李长之这种对待批评的态度，对发展和繁荣批评事业有极大的推进作用。90 年代以来，一些文学批评家违背“求真”的基本要求，致使批评在许多人心目中成了一项极其功利的事情。批评界充斥着种种丑怪现象，如碍于面子，胡乱吹捧；拉帮结派，党同划异；迎合读者，出尽风头。这些批评“是不能真实的”，“都有害于批评”。要使批评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李长之在批评中坚守的“求真”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严格的学术自律。李长之有意“将以批评为专业”，渴望建立一种自有律则的批评理论。他认为“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李长之反对非学术的因素干预批评，明确主张“思想的斗争必须在思想的范围以内去解决”。他说，“思想问题和思想以外的事情（例如政治）搅在一起”，就“不会产生真的批评”。因此，批评主体应该有维护真理的虔诚，能够独立地作出价值判断。对批评独立的追求正是李长之现代批评意识的鲜明体现。我们回顾现代批评走过的风风雨雨，就会发现，李长之毕生所追求的学术自律是多么的难能可贵。长期以来，各种非学术的东西总是粗暴地干涉批评，而政治的幽灵也总是驱之不去，甚至造成批评家人人自危的可怕境况。时至今日，那种不讲学理，大放厥词的骂派批评；那种吹毛求疵，没有同情的无理批评仍在批评界不时出现。要反对这些缺乏律则的批评，就必须大力张扬李长之倡导的学术自律，追求批评的独立品格。正如李长之所说的，批评家“可以不顾一切，为的真理，为的工作，为的使命”。批评家应时时品读这一意味深长的话，做一个李长之所期望的“真正批评家”。

参考文献：

- [1][7][8][10][15] 郝元宝、李书编：《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 年版。
- [2][12][16][18]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 年版。
- [3] 李长之：《德国的古典精神》，东方书社，1943 年版。
- [4]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出版，1984 年版。
- [5] 李长之：《李白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年版。
- [6] 李长之：《西洋哲学史》，正中书局，1939 年版。
- [9][11] 李长之：《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1942 年版。
- [13] 李长之：《现代美国的文学批评》，《现代》，第 5 卷第 6 期。
- [14] 李长之：《梦雨集》，商务印书馆，1945 年版。
- [17]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责任编辑：群 喜)